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David Harvey

[美] 大卫·哈维 著

王钦 译



新自由主义简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自由主义简史

David Harvey

【美】大卫·哈维 著

王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自由主义简史 / [美] 哈维(Harvey, D.) 著; 王钦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12
书名原文: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ISBN 978-7-5327-5091-7

I. ①新… II. ①哈… ②王… III. ①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研究 IV. ①F091.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2265 号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Copyright © David Harvey,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0-118 号

新自由主义简史

[美] 大卫·哈维 著
王 钦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96,000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5091-7/F·192
定价: 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9025

致 谢

图 4.1, 4.3, 4.4 和 5.1 承蒙 Guilford 出版社允许转引, 引自 P. Dicken,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4th Edition, 2003。

图 1.3 承蒙 MIT Press Journals 允许转引, 引自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 - 1988,'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1 (February, 2003)。

图 5.2 承蒙 J. Perloff 允许转引, 引自 Wu, X and Perloff, J,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over Time: Reasons for Rising Inequality*. CUDARE Working Papers 977。

图 1.6 承蒙 Verso 出版社允许转引, 引自 R. 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2003。

图 1.4, 1.7, 1.8, 1.9 和 7.1 承蒙杜梅内尔与列维允许转引, 见网址 <http://www.cebremap.ens.fr/levy>。

图 1.2, 1.5 和 6.2 承蒙出版商允许转引, 引自 *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by 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 translated by Derek Jeff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200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图 4.2 承蒙 Blackwell 出版社允许转引, 引自 S. Corbridge, *Debt and Development*, 1993。

目 录

图表与表格列表 001

致谢 001

导论 001

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 006

第二章 建立赞同 046

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国家 074

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 100

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137

第六章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175

第七章 自由的前景 211

参考文献 238

索引 250

译后记 285

图表与表格列表

(标注页码为本书边码)

图表

- 图 1.1: 1970 年代经济危机: 美国和欧洲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情况, 1960—1987 14
- 图 1.2: 1970 年代的财产滑坡: 美国收入最高的 1% 人口所持资产份额, 1922—1998 17
- 图 1.3: 阶级权力的恢复: 美国、英国和法国收入最高的 0.1% 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 1913—1998 17
- 图 1.4: 美国财富和收入的集中: 行政总裁薪资与美国平均工资的关系, 1970—2003; 最富裕家庭的财产份额, 1982—2002 18
- 图 1.5: “沃尔克休克法”: 美国和法国的实际利率波动, 1960—2001 24
- 图 1.6: 对劳工的打击: 美国实际工资与生产力, 1960—2000 25
- 图 1.7: 上层阶级税收起义: 美国收入最高与最低人群的税率, 1913—2003 26
- 图 1.8: 从境外榨取盈余: 美国的国内和国外收益率, 1960—2002 30
- 图 1.9: 流入美国的贡金: 从世界其他地区所获利润和资本收益

与国内利润的关系 30

图 4.1: 全球境外直接投资版图, 2000 91

图 4.2: 1982—1985 年国际债务危机 96

图 4.3: 2000 年墨西哥主要马圭拉部门的就业情况 103

图 4.4: 韩国走向海外: 境外直接投资, 2000 108

图 5.1: 1980 年代中国向外国投资开放地形图 130

图 5.2: 中国收入日益不平等: 农村与城市, 1985—2000 142

图 6.1: 每年和每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速率, 1960—2003 155

图 6.2: 金融资本霸权: 美国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资本净值和利润率, 1960—2001 157

图 7.1: 美国在全球资本和所有权流动上的衰退地位, 1960—2002: 美国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和外资所有所占份额 191

表格

表 5.1: 资产流入测量: 外国贷款、海外直接投资、契约联盟, 1979—2002 123

表 5.2: 变化中的中国就业结构, 1980—2002 128

导 论

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 1978—1980 这几年视为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1978 年，在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共产党管制的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朝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邓小平规定的道路是：以史上罕见的持续发展速度，在二十年之内把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活力中心。而在太平洋彼岸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一个相对陌生的人物（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于 1979 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局（US Federal Reserve）主席，并在数月内彻底改变了货币政策。美联储此后不计后果地（尤其是失业问题）遏制通货膨胀。大西洋对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 1979 年 5 月当选英国首相，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接着，1980 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美国总统，以其待人接物的个人魅力，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其手段则是通过支持沃尔克在美联储的行动，加之一系列特殊的政策配合，以限制劳工力量，为工业、农业和能源开采业松绑，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解放金融能量。上述震源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力，而这些推动力的传播和反响看来要使周遭世界的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些广泛而深远的转变并非偶然。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的

2 是，这种新的经济结构——通常被归在“全球化”一词下——借助什么手段方式从旧的结构内部迸发出来。沃尔克、里根、撒切尔和邓小平所采用的理论都是长期存在于话语流通中的非主流部分，他们把这些非主流理论变成了主流理论（尽管无一不经历了漫长的努力）。里根复苏的共和党内非主流传统要回溯到 1960 年代初的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邓小平看到了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和高涨的影响力，力图调动市场社会主义而非中央计划来保护并促进国家利益。沃尔克和撒切尔均以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学说而受人瞩目，他们把这种学说转化为指导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的核心原则。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学说——其起源、兴起和意义。^①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例如，国家要确保货币的质量和信誉(integrity)，还必须建立必要的军事、国防、治安和法律组织和职能以确保个人财产权，并在需要用武力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

^① S. George, '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Twenty Years of Elite Economics an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for Structural Change', in W. Bello, N. Bullard, and K. Malhotra (eds.), *Global Finance: New Thinking on Regulating Capital Markets* (London: Zed Books, 2000) 27 - 35; G. Duménil and D. Lévy, *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trans. D. Jeff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J. Peck,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is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3 (2004), 392 - 405; J. Peck and A. Tickell,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34/3 (2002), 380 - 404; P. Treanor, 'Neoliberalism: Origins, Theory, Definition', <http://web.inter.nl.net/users/Paul.Treanor/neoliberalism.html>.

在那些不存在市场的领域(土地、水、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或环境污染等领域)，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也要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预期市场信号(价格)，同时也因为庞大的利益集团终将为自己的利润而扭曲和妨碍政府干预(特别是在民主制国家中)。

自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的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时出于自愿，但有时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并至少对一些政策和实践做出了相应调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迅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甚至当代中国(如下文所示)似乎也在这一方向上奋力前进。此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大学和许多“智囊团”)、媒体、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财政部、央行)，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

3

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①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会因此最大化；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这需要种种信息创造技术和能力，积累、储存、传递、分析，使用庞大的数据库，用以在全球市场指导决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

4 信息技术便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追求（致使有些人声称诞生了一种新的“信息社会”）。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我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②地理跨度越大越好（由此是对“全球化”的强调）、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后一方面对应了利奥塔的著名描述，即把后现代状况描述为“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在政治事务上”，“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这样一种市场伦理统治在文化上的后果不计其数，我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已有探讨。^③

虽然如今对于全球性转型及其后果已经能给出多种总体解释，但人们在总体上却疏忽了一点（这也是本书想要填补的漏洞）：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无人问津。此外，批判性地考察这个故事将给出一种框架，用以确认和建构替代性的政治和经济安排。

① Treanor, 'Neoliberalism'.

② 参见哈维：《后现代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译者

③ 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J.-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66.

我从最近几次与 Gerard Duménil, Sam Gindin, Leo Panitch 的对谈中获益良多。而一直以来给我帮助的人则包括 Masao Miyoshi, Giovanni Arrighi, Patrick Bond, Cindi Katz, Neil Smith, Bertell Ollman, Maria Kaika 和 Erik Swyngedouw。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于2001年11月在柏林举办的新自由主义研讨会引发了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我要感谢纽约州立大学研究中心主任 Bill Kelly 以及我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兴趣和支持(首先是人类学规划项目的同事和学生)。当然,他们都不负文责。

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

- 5 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概念装置就能牢固确立在常识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性人物认为，关于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关重要，是“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此而言他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因为这类理想确实是引人注目并有说服力的。他们认为，这些价值不仅受到法西斯主义、权威主义、共产主义的威胁，还受到一切政府干预形式的威胁，因为这些干预以集体判断取代了个人的自由选择。

关于尊严和个人自由的种种概念本身就有力而吸引人。此类理想促使冷战结束前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异见分子发起运动。1968年席卷世界的学生运动——从巴黎和芝加哥，到曼谷和墨西哥城——一部分源于追求更多的言论自由和个人选择自由。总体而言，这些理想吸引的是每个将自己为自己做决定视若圭臬的人。

长期嵌于美国传统内的自由理念在近些年扮演着显赫的角色。“9·11”被许多人直接解释为对于自由理念的攻击。布什总统在“9·11”周年纪念时写道：“一个愈益自由的和平世界能为美国人带来长远利益，并体现一贯的美国理想，团结美国的盟

友。”他总结说：“人性掌握了这样一种机遇，让自由战胜其所有顽固的敌人”，而“美国愿意肩负为此伟大使命冲锋陷阵的任务”。这些话很快被纳入美国国防策略文件。布什后来还说：“自由是上帝给世上每个男人女人带来的礼物”，并加上一句：“我们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有义务推动自由的传播”。^①

在为针对伊拉克实施先发打击辩护的所有其他理由都被证明是徒劳之后，总统便寻求自由理念的帮助：给伊拉克带去的自由本身就足以证明战争的合法性。伊拉克自由了，而这才是重要的事情。但是，在此设想的“自由”是何种自由呢？因为，正如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②很久以前就睿智地指出的，“自由是匹好马，但关键看它向何处去。”^③那么，伊拉克人民能指望拜武力所赐的自由之马带他们去向何处呢？

布什政府在2003年9月19日给出了回答，时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负责人的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颁布了四项法令，包括“国营企业完全私有化，外国公司对伊拉克企业的完全所有权，外资盈利交还本国……伊拉克银行开放由外国管理，给外国公司国民待遇……清除绝大多数贸易壁垒”。^④这些法令应用于所有经济领域，包括公共服务、

^① G. W. Bush, 'President Addresses the Nation in Prime Time Press Conference', 13 Apr.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420040413-20.html>.

^② Matthew Arnold(1822-1888): 英国诗人、批评家，著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等。——译者

^③ Matthew Arnold 引文出自 R.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850*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8), 118.

^④ A. Juhasz, 'Ambitions of Empir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Plan for Iraq (and Beyond)', *Left Turn Magazine*, 12 (Feb./Mar. 2004), 27-32.

传媒、制造业、服务业、运输业、金融业和建筑业。只有石油除外(大概是因为石油作为偿付战争费用的税收来源这一特殊地位,及其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劳动市场受到了严格管理。主要部门的罢工被有效禁止,而成立工会的权利也被限制。同时,一种相当倒退的“单一税制”(这是美国保守党一直以来呼吁实行的雄心勃勃的税制改革计划)也被强制实施。

有些人指出,上述法令触犯了日内瓦和海牙公约,因为占领国的任务是保护被占领国的资产,而不是变卖它们。^①一些伊拉克人强烈反对将这种被伦敦《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称为“资本主义梦想”的政制硬塞给伊拉克的做法。美国指派的临时管理当局的一位成员激烈批评这种强行实施“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做法,称之为“置历史于不顾的错误逻辑”。^②虽然布雷默的法规由占领国强行实施或许是不合法的,然而,若通过一个“主权自治”(sovereign)政府批准,这些法令则可以变成合法的。由美国指派的过渡政府在2004年6月末接管伊拉克并宣告“自治”。但这个政府所有的权力仅仅是批准既有的法律。在移交权力之前,布雷默增加了许多法律,具体到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规则的细枝末节(规定的细节包括版权法和知识产权),表示希望这些制度安排可以“具有自身的生命和活力”,从而不会被轻易推翻。^③

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布雷默勾勒的种种举措都是必要而充

^① N. Klein, 'Of Course the White House Fears Free Elections in Iraq', *Guardian*, 24 Jan. 2004, 18.

^② T. Crampton, 'Iraqi Official Urges Caution on Imposing Free Market', *New York Times*, 14 Oct. 2003, C5.

^③ Juhasz, 'Ambitions of Empire', 29.

分的，这样才能创造财富并因此改善人民的生活。市场和贸易的自由保障个人自由，这一前提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特征，并长期以来在美国对待世界其他地方的姿态上占据主导地位。^①美国试图借助武力强加给伊拉克的显然是这样一种国家机器，其根本任务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资本积累创造种种条件。我把这种国家机器称为新自由主义国家。这种国家所体现的自由，反映的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企业利益、跨国公司的利益、金融资本的利益。简言之，布雷默引领伊拉克人把自由之马骑到新自由主义的畜栏里。

值得提醒的是，第一次新自由主义国家形态的实验是在智利，发生在1973年皮诺切特(Pinochet)的“小9·11”政变之后（正好是布雷默宣布建立伊拉克政权前三十年零一天）。反对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民选政府的政变由国内经济精英推动，他们感到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倾向会危及他们。这次政变得到美国企业、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支持。政变暴力镇压了一切左翼社会运动和组织，取缔了各种形式的民众组织(包括贫民区的社区卫生中心)。劳动力市场从管理或制度约束(如工会)中“解放”出来。但是该如何复苏停滞的经济？之前在拉丁美洲发展经济时占据主导的进口替代政策(通过财政援助或关税保护促进民族企业)已经声名狼藉，尤其是在智利，这些措施在那里从未奏效。随着全球经济萧条的到来，人们吁求一种新的途径。

一批以“芝加哥帮”(the Chicago boys)著称于世的经济学家

^① G. W.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11 Sept. 2002, A33.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可参下述网址：www.whitehouse.gov/nsc/nss。

(因为他们和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关系密切) 被召集起来帮助重建智利经济。他们被选拔的过程很有趣。美国自 1950 年代起便资助智利经济学家, 让他们到芝加哥大学进行培训, 这项目是为平衡拉丁美洲左翼势力的冷战计划中的一部分。在芝大受到培训的经济学家逐渐在圣地亚哥的天主教私立大学占据主导。1970 年代初期, 经济精英通过一个名为“星期一俱乐部”(the Monday Club) 的团体组织起来, 反对阿连德政府, 并与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工作关系, 由研究机构资助他们的工作。在皮诺切特政治上的对手、凯恩斯主义者古斯塔夫·雷将军 (General Gustavo Leigh) 于 1975 年被逐出政府后, 皮诺切特将这些经济学家引入政府, 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贷款。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工作的过程中, 这些经济学家根据他们的理论重组了智利的经济结构。他们中断了国有化进程并将公共财产私有化、开放自然资源(水产业、木材等等)给私人开采且对剥削不加管制(在很多情况下对当地居民的要求置之不理)、将社会保险私有化、促进国外直接投资和更自由的贸易。这保障了外国公司有权将其在智利的获利转回本国。出口导向型发展取代了进口替代型发展。保留给国家的仅有部分是主要资源铜(正如伊拉克的石油)。这被证明对国家财政预算的稳定非常关键, 因为铜收入完全流入国库。智利经济在增长率、资本积累、外资的高盈利率等方面的快速复苏只是昙花一现。它在 1982 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上就出了大问题。结果,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出于更为实际的目的而非意识形态考虑, 诸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得以实施。所有这些, 包括实用主义在内, 为随后(撒切尔领导的)英国和(里根领导的)美国在 1980 年代转向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外围地区进行的残酷实验